

從古詩中讀出更好的自己

任白

一直有個印象，在古詩詞中有個關於兒童的高頻稱謂，那就是牧童。這很好解釋，農耕社會，總角小童，牧牛於野，一幅田園牧歌式的標誌性日常圖景。「草滿池塘水滿陂，山銜落日浸寒漪。牧童歸去橫牛背，短笛無腔信口吹。」（宋·雷震《村晚》）山環水繞，草木向晚，牧歸的孩子嘴裏銜着短笛，頓挫成曲，漫無腔調，如同悠長的鄉間歲月。或者可以說，晴耕雨讀和夕照牧歸是古代文人士理理想的兩個可視化場景，其中包含着對廟堂之險與江湖之惡的拒斥。「騎牛遠遠過前村，吹笛風斜隔籬門。多少長安名利客，機關用盡不如君。」這首黃庭堅的《牧童》更是充滿了對官場名利的蔑視，據載它寫於宋皇祐三年（一〇五一年），其時作者尚幼（黃庭堅生於一〇四五年），如果屬實，說明這個不世出的天才過早地洞悉了世間沉浮，也多少喻示了自己屢遭貶謫的命運。黃庭堅一生耿介，為官場所不容，但幼時所懷之志終生未泯。五十多年後的一〇四四年（徽宗崇寧三年），晚境中的他在《虞美人·宜州見梅作》中寫下「平生個裏願懷深，去國十年老盡少年心」之句，雖云少年心老，但內心憂憤未曾稍歇。明於此，我們在古詩詞中讀到的牧童就不僅是一個快樂無憂的少年，而是寄託了古代文人抱樸尚真理想的人世情懷。「誰人得似牧童心，牛上橫眠秋聽深。時復往來吹一曲，何愁南北不知音。」（唐·盧肇《牧童》）「清明風日雨乾時，草滿花堤水滿溪。童子柳陰眠正着，一牛吃過柳陰西。」（宋·楊萬里《桑茶坑道中八首·其七》）「春暖平原煙草肥，柳陰牧笛夕陽微。

兒童慣識林塘路，縱着鞭繩月下歸。」（明·曹義《題牛背牧童》）可以說，牧童形象貫穿了整個中國古代詩歌史，有他們在青牛背上吹響短笛，中國文人的田園之樂就會得以延續。當然，只有田園無以稱天下，只有牧童也長不成三千年的歷史。像世界上任何族群一樣，中國人也總是在平行，甚至相悖的不同向度間奔波度日。

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萬事成蹉跎。世人若被明日累，春去秋來老將至。朝看水東流，暮看日西墜。百年明日能幾何？請君聽我明日歌。

這首明人錢鶴灘的《明日歌》自誕生之日起，大概要算被徵用最頻繁的工具之一，也是孩子們最為依賴的「勵志神歌」，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和牧童短笛相比，那些鼓舞元氣的激盪之聲，有着更為廣泛主流的應用場景。畢竟，在傳統文化「有為」與「無為」的反覆切換中，「有為」永遠是站在起點上的一方。

何事居窮道不窮，亂時還與靜時同。家山雖在干戈地，弟侄常修禮樂風。窗竹影搖書案上，野泉聲入砚池中。少年辛苦終身事，莫向光陰惰寸功。

這是唐人杜荀鶴的《題弟侄書堂》，身經亂離的詩人把人生的基本處境設定為「干戈地」，強調人生本質上的悲劇性，這種基調就讓田園逸樂成了一种奢望，倒悲劇中人窮且益堅，在亂世向着寧靜的內心秩序不斷抵近。人生在世，有多少可以期待的天賜之福嗎？並

沒有，但在諸多不稱意中建立起一種能夠自足自洽的價值系統，用來安放英雄氣短後的無盡喟嘆，那才是人間天堂。當然，這種自足也可以表現得更加日常，像蘇東坡在《和董傳留別》中所寫：

粗糲大布裹生涯，腹有詩書氣自華。厭伴老儒烹瓠葉，強隨舉子踏槐花。囊空不辦尋春馬，眼亂行看擇婿車。得意猶堪誇世俗，詔黃新濕字如鴉。

堅信詩書之氣可以作為一種能量，用以與「尋春馬」和「擇婿車」在世俗場景中對峙，這本身就是對精神價值的隆重加冕，這種自我確認其實是古代士人安身立命的重要基礎，是內心自由的基本保障，也是燦爛的中國古典文化的邏輯起點。

當然，必須強調的是在中國古代的語境中，勸學勵志一直很難擺脫成就事功，做稻粱謀的背景，甚至被其深深綁架。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房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男兒若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

宋代趙恒寫下這首《勸學詩》時大概沒有想到，這種赤裸裸的功利化為學觀影響如此深遠。這種誤導使格物致知的古訓被束之高閣，使我們失去了對真理永無止境的渴求與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氣。

寫到這兒，我想說的是詩歌是中華文化的燦爛瑰寶，但像任何一項寶貴遺產一樣，豐富本身就是一座迷宮，今天的孩子們應該在現代智慧的引導下，在梳理中甄別良莠，在揚棄中留住魂魄，在中華詩教中發現和塑造更好的自己，就如劉禹錫在《浪淘沙九首·其八》中所說：「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



湖北省武漢市洪山區未來實驗小學美林校區學生在讀書日活動中吟誦古詩。資料圖片

七日談

吉林篇

不說「不」的智慧



如是我見 楊不秋

對一些人而言，說不，是需要勇氣的。對我而言，不過就是直截了當地表達拒絕。既然內心已有明確的喜惡，為什麼要忍着不說讓自己不舒服呢？

我一直都是直言不諱，大大方方地說不。剛工作時，我曾被派去深圳。最不習慣的就是語言，廣東話完全聽不懂。有次開會，當地同事自發開啟廣東話模式。我聽得雲裏霧裏，然後刷地一下站起來說：麻煩大家不要講廣東話。

雖然我也覺得身在職場要學會看人眼色行事，不應該太特立獨行，可是如果不說，任由無效溝通，那豈不是對工作不負責？相比藏着掖着、彎彎繞繞，坦蕩說不，就是大寫的明明白白。

然而，人和想法，都會改變且無法預料。比如當初那個有勇氣且理直氣壯請大家不要講廣東話的我，在若干年後，每天的工作和生活都已經完全離不開廣東話。

在職場中有那麼一些人，我發現他們彷彿永遠都不會說不。他們並非缺乏勇氣「不敢說」，也不是屈服於職場的叢林法則「不能說」；他們只是盡量以體面又不失專業的方式，以盡可能讓大家都會尷尬或者不舒服的方式去表達。即便他們沒有明確說不，對方也依然可以捕捉到他們的不傾向和不偏好。

「我們下周約工作午餐好嗎？可以把這個計劃再詳細過一下。」

「可能我還需要再看一下我的日程，最近的午餐日程安排比較滿。沒關係，有關細節，咱們也可以隨時電話或者電郵交流。」

「這份計劃書，除了項目A，是否也可以一併包括項目B？」

「我們需要再確認一下，因為兩個項目在操作層面的差異，合併上報恐怕有容易混淆不清的可能。」

類似的對話，經常出現在我現在的職場環境中，在合作夥伴之間，或者是上下級。相比乾脆的拒絕和否定，婉轉表達確實避免了負面的語言可能帶來的消極氛圍，令大家無需陷入到否定帶來的對立情緒。重要的是，不說不，其實是在幫自己保留了更多的可能性和選擇權，給自己留下了改變心意的迴旋空間。

如果時光倒流，回到我剛搬去深圳的那個秋天，我還是會在那個聽不懂廣東話的會議中站起來，但是我不會強硬地讓大家不要講廣東話。我可能會虛心請大家有空多教我學廣東話；而在廣東話畢業之前，請大家開會都說普通話。

縱然我太過魯直，兜兜轉轉這麼多年終於明白：說不，也許是勇氣；不說不，才是智慧。

大公報

【大公報人物志】



胡政之

李春陽

大公報人物志

胡政之兩次入主《大公報》，為這個報紙工作過二十七年，是與《大公報》淵源最深且貢獻最大之人。

胡政之一八八九年生於四川成都，父親胡登崧是甲午科舉人。胡政之曾入讀安徽省高等學堂，讀過嚴復《天演論》，並且對桐城派姚鼐和方苞的文章下過功夫。十七歲留學日本，曾與吳鼎昌同學，後轉入東京帝國大學法科。他通英語日語，能閱讀意大利文和德文，回國後曾做律師。一九一六年由徐樹錚推薦，擔任王郅隆時期的《大公報》經理兼總編輯，為《大公報》工作近四年。一九一九年胡政之以《大公報》記者身份赴歐洲採訪巴黎和會，是出席此一重大國際會議的唯一中國記者。他有志於新聞事業，曾遍訪法國、德國、英國和意大利最著名新聞通訊社，期間他在《大公報》發表評論文章達五百篇。回國後由於王郅隆去世，《大公報》萎靡不振，轉投林白水在北京的《新社會報》任總編輯。從一九二一年八月到一九二六年八月，胡政之創辦國聞通信社和《國聞報》，開始自己的新聞事業，這一舉措為將來新記《大公報》打下了基礎，積累了辦報經驗，也培養了人才，李子寬、金誠夫、何心冷、杜協民等，皆曾是《國聞報》的骨幹編輯與經理。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創刊的新記《大公報》，吳鼎昌出任董事長兼社長，胡政之任總經理兼副總編輯，張季鸞是總編輯兼副總經理，三者各有專長，既合作又分工明確。陳紀濤曾說，「季鸞先生的如椽大筆固然已影響了中國重要的時期，使《大公報》的地位抬高；然而如果不是賴胡政之先生的擊劃經營，使報紙銷行全國，可能它的影響力要大打折扣。」

一九三一年日軍佔領東北，遠在天津

胡政之



胡政之。

的新記《大公報》受到日本在華北勢力的擠壓，不得不從天津的日租界搬至法租界，這是他們流亡辦報的開始，六天內搬完印刷設備、字模紙張等全部家當。陳紀濤說「冒險犯難是政之先生一生最輝煌的精神發揮，積極創業更是他追求的崇高理想。」早在盧溝橋事變前兩年，胡政之已開始籌劃向南方擴展。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滬版《大公報》創刊，「八一三」抗戰爆發後，上海與各地交通中斷，隨後胡政之又創辦漢口版《大公報》。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香港版《大公報》出版，「我們此舉，純因廣東地位異常重要，中國民族解放的艱難大業，今後需要華南同胞努力者，更非常迫切。」滬版上市之後，胡政之判斷日軍有南犯趨勢，而香港非可守之地。所以在一九四〇年派王文彬籌建桂林大公報館。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五日桂版創刊。胡政之說，「那時我們在桂林東郊有荒地三十七畝，開闢草萊，種菜植樹，並自建防空洞三個，日機雖然常常轟炸，出版絕不受影響，具有百年抗戰的

絕大決心。」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香港淪陷，港版停刊，桂林館成為港版的退路。胡政之說，「《大公報》雖然逃難，但它每一次被毀，我總有勇氣去把它再建設起來。」抗戰勝利後，他還醞釀在海外辦報，先在美國出版了英文的《大公報紐約雙周》，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恢復了《大公報》香港版。由於操勞過度，他於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四日在上海病逝，終年六十歲。

楊應樵曾說，「事實上，我們看《大公報》在國難中，由津而滬，而漢，而渝，又由滬而港，而桂，以及戰後各館的次第復刊，主要的都是由政之先生事先的決策，並經過綿密的籌備，而最後實現的。他那高瞻遠矚的眼光，大氣磅礴的行動，在現代中國報壇，相信是很少能有人和他比並的。」

徐鑄成說，「邵飄萍、黃遠生諸先生富有採訪經驗，文筆恣肆，而不長於經營。史量才、張竹平、汪漢溪諸先生工於籌計，擊劃精至，而不以著述見長。在我所了解的新聞界前輩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稱多面手，『文、武、崑、亂不擋』。後起的如成舍我等輩，雖然也精力充沛，編輯、經營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與胡相比。」

程仲文認為「《大公報》之所以能成為最有貢獻於中國現代文化的三大機構——北京大學、商務印書館、《大公報》——之一，得力於胡先生的擊畫指導者甚多。」

胡政之一生本着「事業向前，個人後退」的原則。他說：「報人信條的全部精華，就是中國古書所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但是我卻力主應加上一句，即『毀譽不能動』。」

潮汕端午美食



文化什錦 方曉嵐

潮汕，包括了潮州、汕頭、揭陽等地區，土地肥沃，世代傳承了江浙的稻作文化，民生種種，都體現在米食文化中，因為有三百多公里的海岸線，所以飲食同時具有海洋的特色。潮汕人日常生活離不開與米有關的食物，各種不同的粿，乾的、濕的、炸的、煎的、煮的，一應俱全。

我外婆的家鄉是潮州，家住府城大街，小時候外婆在香港與我們同住，潮州菜和潮汕小吃是伴着我成長最美好回憶。記得潮州的鄉里們不時來看外婆，他們會捎來一些潮州特產，包括普寧豆乾、菜脯、鹹檸檬、南薑鹹欖，這些手信都不是值錢的東西，但在那物資缺乏的艱苦歲月，帶來的是一份濃濃的鄉情。每年臨近端午節，鄉親們捎來大袋各式的潮州粿，我們家吃好幾天。

潮洲人很重視節慶，端午互送粽子是禮尚往來，清明過後就開始準備。潮州粿有不同的味道和做法，與廣東粿最相似的是鹹水粿。

潮洲的鹹水粿，叫做梘粿，是一種素粿，不放豬肉蝦米，更不會放豬油，吃時用

線牽拉切成小塊，蘸白糖或淋上糖漿食用。黃梘子是一種有清熱解毒功效的藥材，把黃梘子搗碎後浸出黃色的水拌入糯米來製粿，蒸出來的糯米是晶瑩的黃色，正宗的梘粿還要加入活血祛風的白蒲薑，是潮汕地區一種常見的藥材，可見潮汕民間有藥食同源的理念。

在清嘉慶年間，在汕頭郊野建了一間天后宮，供奉媽祖娘娘，周圍地區慢慢形成了一個社區，光緒五年重建，民間俗稱為老媽宮，這裏也成為熱鬧繁榮的市中心。民國時期，一戶張姓人家在老媽宮對面擺檯賣粿，一代一代傳了百多年，特色是粿子的餡料有蝦米、冬菇、鹹蛋黃、栗子、方魚、蓮子和一大塊南乳豬頭，但同時夾一層豆沙，鹹甜兼備。老媽宮粿粿，有賴媽祖文化的廣泛影響，流傳至今，成為天后宮的特色美食。在香港，端午期間我們也能吃到這種鹹甜兼備的潮州粿，在尖沙咀北京道的華苑潮州菜館有售，值得一試。

每年端午節前後，市場上有薄殼出售。一盆滿是泥污，結成一串串的小貝殼，這小

東西叫做薄殼，顧名思義，外殼很薄易碎。薄殼形狀像瓜子，所以俗稱海瓜子，屬貝殼類，學名叫做「尋氏肌蛤」，殼裏面的肉很細小，卻是潮州菜中最具獨特風味的食材之一。薄殼產於我國福建至潮汕地區的海邊沿岸，是一種非常廉價的海產。入秋時節，漁民用拖網船連魚蝦薄殼一起捕獲，潮退時也可以在海邊灘塗中拾得到，所以薄殼是平民百姓的海鮮，等到立秋之後，薄殼個子更肥滿，味道更鮮美。

薄殼有公母之分，紅肉為母，白肉為公，味道一樣鮮美。汕頭澄海鹽鴻，是著名的薄殼產地，在薄殼當造的季節，當地會舉行薄殼節，食肆更有薄殼宴，全席絕大部分的菜式的主角都是薄殼，菜式有金不換炒薄殼、薄殼米煎蛋、薄殼米金瓜煲、薄殼米條卷、薄殼煮番瓜、薄殼米腸粉、薄殼米炒飯等等，盡顯薄殼的美味，成為當地的特色。香港的潮州餐館，炒薄殼一定離不開蒜頭和金不換（蘿勒），金不換炒薄殼不只是傳統的潮州菜，也是一道著名的泰國菜。



▲潮州粿（左），炒薄殼（右）。作者供圖

薄殼除了可以連殼炒吃之外，還有去掉殼成薄殼米。鹽漬薄殼米叫做「鳳眼蛙」，這「蛙」字不是指三文魚，在潮州語中「蛙」的意思是一種鹽漬的海產。小時候親戚由潮州來香港看外婆，有時會帶來一瓶鳳眼蛙，外婆每次吃白糜（粥）時就吃一點點，非常珍惜，它是外婆的專屬品，當然，鳳眼蛙那濃烈的味道，我們小孩子是絕對不會偷吃的。